

1987

石窟考古 编



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



辽宁美术出版社



I S B N 7-5314-0242-4/J · 91

〔辽〕第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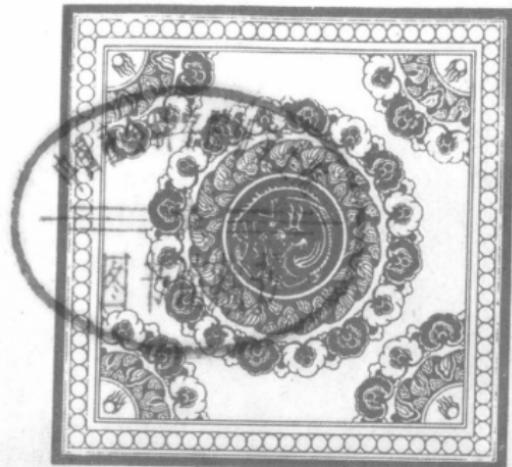
定价：24.00元

1987

K879.216
D 936.1

敦煌石窟研究 国际讨论会 文集

石窟考古编



RAY14/2705



10042817

94010014



辽宁美术出版社

封面设计 栾录章
版式设计 吕嘉惠
责任编辑 孙介凡

**敦煌石窟研究
国际讨论会文集
石窟考古**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发行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 $\frac{1}{4}$
印数：1—1,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7—5314—0242—4 / J · 91

〔辽〕第2号 定价：24.00元

石窟考古编目录

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	刘玉权(1)
莫高窟唐前期石窟的洞窟形制	
和题材布局(摘要)	樊锦诗(30)
敦煌窟龛名数考补(摘要)	金维诺(32)
10世纪中期的莫高窟崖面概观	
—关于《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的	
几个问题	马德(40)
莫高窟外貌变迁的几个问题	潘玉闪(53)
关于220窟改修的若干问题	[日]藤枝晃(67)
再谈宿白的凉州模式	[新加坡]古正美(85)
从巴米扬到敦煌	[日]樋口隆康(117)
河西北朝中心柱窟	张宝玺(123)
北魏时期的甘肃石窟寺概述	董玉祥(165)
吐峪沟第44窟与莫高窟北凉洞窟	
比较研究	贾应逸(184)
敦煌早期壁画中的天宫伎乐	万庚育(198)
敦煌石窟中的《观无量寿经变相》	孙修身(215)
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	李永宁 蔡伟堂(247)
论莫高窟和麦积山等处早期洞窟中的	
交脚菩萨	张学荣 何静珍(273)
莫高窟275窟交脚菩萨像与犍陀罗诸	
先例(摘要)	[日]肥塚隆(288)
弥勒信仰与敦煌《弥勒变》的起源	王静芬(290)

《父母恩重经》写本与变相	马世长(314)
刘萨河事迹与瑞像图	饶宗颐(336)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壁内容考释	贺世哲(350)
敦煌的药师经变与日本的	
药师如来像	[日]百桥明穗(383)
禅定比丘图像与敦煌285窟	[日]须藤弘敏(393)
《金光明经变》研究	施萍亭(414)
敦煌石窟的《梵网经变》	霍熙亮(456)
敦煌所见《五台山图》与《五台山赞》	杜斗城(507)
敦煌莫高窟与中国古代家具史研究之一	
—公元5至6世纪中国家具的演变	杨泓(519)
沙州、地图和鬼魅	[法]露丝特·布尔努瓦(533)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及其学术价值	耿昇(556)



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

刘玉权

(一) 引言

“沙州回鹘”作为一个专题，史学界展开研究讨论是本世纪后期的事，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进展。^①这个研究课题也带动了对沙州回鹘洞窟进行考古研究。

本世纪 60 年代，我们在敦煌西夏石窟考古过程中，曾注意到当时准备划为西夏的一部分洞窟，其壁画风格同新疆吐鲁番地区回鹘高昌时期洞窟的壁画风格颇为近似，某些局部和细节基本相同，甚至完全相同。特别是着回鹘装的供养人画像更加引人注目。当时，由于尚未对吐鲁番地区回鹘高昌石窟寺作实地考察，又由于参考资料和业务水平的局限，没有能将沙州回鹘洞窟区分出来，仅仅把上述现象理解为西夏佛教艺术同回鹘高昌佛教艺术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现在，我们考察过吐鲁番地区回鹘高昌佛教石窟遗迹，借助关于沙州回鹘史的研究成果，可以将沙州回鹘洞窟的考古研究深入一步。

本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重点探讨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问题，

毫无疑问必然涉及有关沙州回鹘的史学问题。由于沙州回鹘的史料贫乏，论者颇有分歧，一时尚难有个被学术界公认的结论。笔者在这篇文章里，对此不可能作详细地专题讨论，仅仅陈述某种看法而已。

(二) 关于沙州回鹘

公元 976 年，北宋政府“遣殿直张璨（一作张璇）齋诏谕甘、沙州回鹘可汗外甥，赐以器币，招致名马、美玉，以备车骑珍璜之用。”^②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沙州回鹘的首次明确记述。此后，类似记述在史料中频频出现，这里择其要者列于后：

- (1) 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闰三月二十六日，甘、沙州回鹘遣使裴溢的名似等来贡橐駝、名马、珊瑚、琥珀、良玉。”^③
- (2) 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回鹘有甘州、沙州、西州、新复州数种。而甘州地逼西夏，其可汗夜落纥曾与沙州可汗禄胜数出兵为李继迁难。继迁死，德明思报仇，遣将张浦率数千骑来抄掠。夜落纥出兵拒之，西夏败走。”^④
- (3) 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四月，沙州回鹘曹贤顺遣使来贡于辽。”^⑤
- (4) 天禧四年（1020 年）“七月，辽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贤顺衣物。”^⑥
- (5) 同年（1020 年）“九月，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贤顺遣使来贡方物。”^⑦
- (6) 天圣八年（1030 年）“回鹘瓜州王请降（于西夏）。”^⑧
- (7) 庆历元年（1041 年）“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⑨

(8) 庆历二年（1042 年）“沙州北亭可汗王遣大使、密副使张进零、和延进、大使曹都都（督）、大使翟入贡于宋。”^⑩

(9) 南宋建炎元年（1127 年）“冬十月，沙州回鹘遣使贡于金。”^⑪

(10) 同年（1127 年）“冬十月，沙州回鹘活刺散可汗遣使入贡于金。”^⑫

此外，史料中虽未直接指名但不难判断关于沙州回鹘的记载，尚有不少，无需一一罗列。

由上可知：沙州回鹘出现于瓜、沙曹氏归义军晚期，频繁活动于曹贤顺之后，最后消失于北宋末南宋初，其间历时达 151 年。但主要活动在 976 — 1050 年前后的 70 余年间。纵观这一段历史，不难看出：沙州回鹘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是敦煌及河西地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我们看来，它在历史上的活动轨迹大体如下：

早在 9 世纪中叶之前，瓜、沙二州的东西两侧的甘州和天山一带地区，就居住有回鹘人。^⑬但，瓜、沙二州这时还没有居住回鹘人的明显迹象。9 世纪中叶，回鹘正式涉足瓜、沙，同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杂居，和平共处，先后作为河西吐蕃及张氏归义军政府的臣民和附属蕃族部落。^⑭10 世纪以后，沙州回鹘虽名义上仍为归义军政府的蕃族臣民，而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无多少相互统属的关系，独立性较强。沙州回鹘常常单独遣使，或同甘州回鹘使者结伴入中原朝贡，独立于归义军政府之外另立门户的趋势日益明显。10 世纪下半叶，终于公开打出了“沙州回鹘”的旗号。到 11 世纪初叶，沙州及河西走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新崛起的党项羌人以锐不可挡之势一步步地吞并着河西走廊东端诸重镇，严重地威胁着瓜、沙地区和归义军政权的安全与生

存；另一方面曹氏归义军政权本身走过了自己的盛期，已是日暮途穷，岌岌可危。与此同时的沙州回鹘势力却相对日益强大。1028年，甘州回鹘被党项人击破之后，向西逃散流徙。其中一部分留居瓜、沙，汇入沙州回鹘之中。长期聚集并强大起来的沙州回鹘，在瓜、沙地区面对着虚弱无能的曹氏归义军，已经不是昔日的附庸和顺民，而是举足轻重的强者，是支撑瓜、沙局面的顶梁柱。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即沙州归义军政权上层汉族统治者同回鹘人长期通婚联姻，血统相互渗透，在回鹘人汉化的同时，汉人也在回鹘化。^⑯到了曹宗寿、曹贤顺时期，随着党项人对“丝路”东段的阻隔，归义军政权与中原朝廷的联系渐断绝，瓜、沙二州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实际上处于瓜、沙地区回鹘势力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势之下，归义军汉族政权及其治下的汉人，回鹘化的进程加速，最后，归义军政权的首脑（即敦煌郡王）曹贤顺，也不得不打起“沙州回鹘”这块招牌。

1036年，党项军队夺取肃、瓜、沙三州之时，与之抗拒的力量并非曹氏归义军政权的汉族武装，而是回鹘军队。^⑰表明它的确是瓜、沙地区的实际主宰。许多迹象表明：在曹贤顺主领沙州归义军政权之后不久，党项军攻陷沙州之前，很可能就在公元1030年，在沙州似乎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其表现形式看来是既突然迅速，而又比较平静，如水到渠成似的。结局是沙州回鹘取曹氏归义军而代之，曹贤顺本人很可能就在这次动乱中失权丧命。^⑱瓜州王曹贤惠^⑲见形势不妙，为免遭如其兄的悲惨下场，只好率其亲信和精锐千骑奔降党项。^⑳

党项击败回鹘陷肃、瓜、沙三州，并不等于回鹘和曹氏被消灭。以后这段历史，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党项据有河西走廊之后，一度忙于立国和政权建设，同时忙于扩军备战，与北宋抗衡争霸，无暇顾及边远的瓜、沙二州，对其统治是比较松散的。二

是沙州回鹘和曹氏遗民的势力还比较强大，他们并不就此善罢甘休，而是一面积极联络伊、西州回鹘及其周边的各族反对党项西夏的势力，一面又通过各种渠道突破党项人对“丝路”的封锁，继续同中原北宋王朝取得联系，争取朝廷的声援与支持配合，试图推翻党项和西夏在河西走廊的霸权地位。^{②0}三是北宋朝廷也主动联络、抚慰回鹘、于阗、吐蕃等西夏周边的各族反西夏力量，想借他们的力量“以夷制夷”，铲除西北方的大敌西夏，同时可达到孤立东北方的大敌契丹的目的。^{②1}然而多年的美梦终究未得实现，北宋在西北方的反西夏盟友沙州回鹘，未能击败对手西夏，只好退出历史舞台，公元 12 世纪 20 年代以后，便完全销声匿迹了。

总之，沙州回鹘伴随着沙州归义军政权的衰落应运而生，由沙州归义军政权的附属部落与臣民一跃而为瓜、沙地区之主宰，是一股鲜为后人知的政治势力。它承曹氏归义军政权之余绪而与西夏在河西的统治并存 90 余年。

(三) 关于沙州回鹘洞窟之划分

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先后于公元 10 世纪前后盛行佛教。^{②2}夹在上述两个回鹘王国中间、处中西交通咽喉之地的沙州回鹘，由于长期接受着“善国神乡”^{②3}的薰陶，较早地就染指佛教。南宋人洪皓在他的《松漠纪闻》上卷回鹘条中说到：“……甘、凉、瓜、沙、旧皆有（回鹘）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奉释氏最盛……”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佛经、佛画以及石窟中至今仍保留着的大量回鹘文题记，都是沙州回鹘笃信佛教的有力证据。至于本文将在下面划分出来的一批沙州回鹘装修的佛窟，那就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了。

近蒙段文杰先生关照，他将刚刚收到台湾出版的《漠高窟记》，借给笔者阅读。从中了解到，早在本世纪 40 年代，我国中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在考察莫高窟时，就曾判定出 5 个回鹘洞窟。²⁴ 笔者此次复查，除个别不妥外，余均准确。张大千先生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如此，已是不易。因此，应该说，在敦煌石窟中发现回鹘窟，当为大千先生之创见和首功。美中不足的是除有个别判错之外，没有能考订出相应的历史年代和阐明其划分回鹘窟的依据。这是一个遗憾。

我们认为，判断与划分沙州回鹘洞窟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四条：第一，历史依据，即肯定历史上存在着沙州回鹘，这一点前面已经说清了。第二，洞窟中的回鹘族供养人画像及其题记。这是判定回鹘洞窟最有说服力、最关键的依据。第三，同敦煌以外的回鹘佛教石窟艺术比较，表现出回鹘佛教艺术的特点和风格共性。第四，抓住回鹘佛教艺术所独有的和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的个性因素。这往往是判定时代颇有说服力的依据。第二、三、四诸条，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论述。

我们依据上述四条，在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划分出一批沙州回鹘洞窟。它们分别如下：

莫高窟：第 306、307、308、363、399、418、244（甬道）、409、237（甬道、前室）、148（甬道及内室局部）、309、97、330、310、245、207。计 16 个窟。

西千佛洞：第 4、9（甬道）、10（甬道）、12、13。计 5 个窟。

榆林窟：第 21（前室甬道）、39。计 2 个窟。

以上三处石窟共计 23 个窟。

此次调查表明，这批洞窟除莫高窟第 330 窟可大体认为是回鹘新开凿外，²⁵ 其余全为回鹘对前代洞窟的重修重绘。其中一部分为整窟重修重绘，另一部分为局部重修重绘。被重修重绘的旧

窟，几乎全系隋唐窟。其中重修隋窟 10 个、唐窟 8 个、隋末唐初窟 2 个。^⑯榆林窟第 39 窟，可以见到有上下两层壁画。但，由于表层壁画保存相当完好牢固，从现有个别破损处可看不出底层画究竟属于什么时代。若从洞窟形制分析，因为后室有中心柱，窟前部人字坡顶，其始建时代似可早至隋唐甚至隋以前。或者开凿洞窟后，原不曾绘塑，后被回鹘整窟抹壁重修重绘也未可知。总而言之，上述情况表明，沙州回鹘时，基本没有大规模营建佛窟，而是利用前代旧窟重修重绘。



图 1 药师变 莫高窟第 418 窟南壁西侧



图 2 说法图 莫高窟第 245 窟北壁

(四) 关于沙州回鹘窟的分期与年代

甲 分期：

上述 23 个沙州回鹘洞窟，从绘画风格看，从与敦煌北宋窟和高昌回鹘窟的比较来看，并非属于同一时期、同一种风格与样式，而是有早有晚，属于不尽相同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壁画题材内容布局、人物造型（除回鹘供养人外）、艺术风格诸方面，都保留着较多颇为浓厚的五代、北宋时代之遗风。我们把这种风格与样式的洞窟，姑且称为“敦煌北宋式”（图 1）。时间显然较早，属沙州回鹘前期。另一种是壁画构图、人物造型（含回鹘供养人）、线描、敷彩诸方面，显示出较为清晰的高昌回鹘艺术特

征。我们将这类洞窟姑且称为“高昌回鹘式”（图 2）。这类窟的一些局部和细节，与高昌回鹘窟基本相同，甚至完全一样（详见后述），时间显然较晚，当属沙州回鹘后期。这些洞窟分类分期见附表。

乙 年代：

敦煌石窟中遗存有大量的回鹘文字题记，至今尚未抄录、翻译和整理。敦煌藏经洞还出土相当数量的回鹘文书，翻译整理刊布者还不多。今后随着上述两方面工作的开展，可能发现与修建或者重修回鹘洞窟的时间有关的新资料，眼前我们还未发现这方面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因此，目前要确定沙州回鹘洞窟的绝对年代，是有较大困难的。这里，我们仅能对其相应历史背景和对洞窟中与时间有关的某些蛛丝马迹分析，试图推断沙州回鹘洞窟的相对年代。

(1) 属于沙州回鹘前期的榆林窟第 39 窟，坐落在榆林河西岸北段窟区。窟室坐西向东，建筑结构相当完整，规模较大，并分前后两室，有中心方柱。现存整窟壁画，系回鹘所绘制。前室甬道比其它洞窟都较深长，甬道南北两侧壁，绘有近 50 身男女供养人群像。南侧壁计 22 身男像，全着回鹘装，前面（即西面）第一、二两身供养像形体最高大，在群像中身份和地位最尊贵。第一身头戴三叉冠，着圆领窄袖赭色大团花长袍，腰束带，上挂解结锥、短刀等蹀躞七事。面部浑圆，体态丰健。双手执供器。身后有一侍从，手握长杖，形体比主人低小约半。第二身供养像头戴毡冠（呈卧橄榄形），身着绿色小团花长袍。其服饰装束及其面相体态与第一身基本相同。双手捧钵式香炉。以上两窟主像，其人物造型及衣冠服饰均与莫高窟第 237、148、409 等窟类似。但莫高窟以上诸窟男窟主像头戴莲瓣形高冠，身着团龙长袍，显然系回鹘可汗身份。而榆林窟第 39 窟男窟主像，为一般



图3 男供养人像 榆林窟第39窟前室甬道南壁

回鹘首领，可能是瓜州地方的回鹘首领像（图3）。在甬道南侧壁男窟主第一身像石绿色榜牌上，依稀可见回鹘文题名。在甬道北侧壁女窟主第一身像榜题内，也隐约可见回鹘文题名。遗憾的是十分模糊，摹写抄录和判断辨认都无法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在甬道南侧壁第一身男窟主像与其榜牌之间的素壁上，有淡墨书写的西夏文题记两行，计15个字。其录文及汉译文如后：^{②7}

奴新歎劉惲燒勝供施瓶瓶瓶
千玉乐勢來山寺廟中燒香正心贊福

从题记内容及书写位置看，这是巡礼佛徒的功德题记。这是一位西夏党项族人为祈求幸福而到榆林窟烧香拜佛的。虽然题记本身不曾提供出时代纪年，但西夏文题记同北宋式风格的回鹘壁画间

的叠压关系告诉我们：该窟壁画绘制的时间，当甚近曹氏归义军政权末期。

(2)《西夏书事》卷 11 载：“天圣八年（1030 年）春三月，回鹘瓜州王请降（西夏），德明纳之。瓜州回鹘乃沙州分部，其王贤顺²⁸见德明势日炽，率属请降。”《西夏纪》卷 5 及《宋史·夏国传》卷 485、《长编》卷 109 等，均有类似记载。《西夏书事》和《西夏纪》的作者，在这条材料的后面加了小注，表示怀疑，认为：“时德明虽得甘州，与瓜州尚距千里，中隔肃州，回鹘与夏国世仇，贤顺何以遽降？宋史回鹘传不载，疑误俟考。”笔者过去查阅这段历史时，也曾感到颇不尽情理，有所怀疑。近年来，在学习和研究沙州回鹘史时，觉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公元 1030 年春，沙州回鹘人掀起了一场政治动乱，原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被废弃，甚至可能被杀害，实权落到回鹘人手中。消息传到瓜州，曹贤惠在这种突然的打击下，感到失去了依靠和支柱，很可能危及自己的性命，所以被迫只好向东奔逃，率领一千精锐轻骑投降西夏。其后果怎么也比孤守瓜州、坐以待毙、遭其兄贤顺的下场好得多。因此，最末一任沙州归义军节度使从史料中完全消失，而回鹘人在瓜、沙地区充当主角。所以，当 1036 年党项军队攻瓜、沙、肃三州之时，与其对抗的是回鹘军队而不是归义军军队。

(3) 到目前为止，与瓜、沙有关并有明确纪年的最早西夏文献，是写于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至二年（1070 至 1071 年）的《瓜州审判档案残卷》，这是西夏统治下的瓜州官吏对民间侵夺伤害的反复认真审理的记录，表明至迟在 11 世纪 70 年代前后，瓜州地区确在西夏政权的严密有效的统治之下。²⁹同时考虑到当初属瓜州治下的安西榆林窟，仅有两个回鹘前期窟，却无一个后期窟。这种并非偶然的现象，也表明沙州回鹘后期，西